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9.01.009

《山南水北》：知识分子的还乡书写

王 蕾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 作为一部知识分子“还乡”书写的典范之作,《山南水北》的创作表明,韩少功在其离乡—还乡的人生行走中,一直以“出世之虚心做入世之实事”探索着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并自觉地践行着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道德良知。当韩少功从喧嚣与骚动的时代中退身而出时,其不仅在对自然的皈依中体验“天人合一”之道,于山南水北间追寻人性的本真,而且以朴素的赤子之心、平和的处事之态,来重构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探索和思考人类文明的过去、现代与未来。

关键词: 韩少功;《山南水北》;知识分子;还乡;本真人性;人与自然关系

中图分类号: I207.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9)01-0057-07

引用格式: 王 蕾.《山南水北》:知识分子的还乡书写[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4(1):57-63.

South of the Mountain and North of the Water: Hometown Returning Writing of Intellectuals

WANG Le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As a typical work of “hometown returning” writing by intellectuals, the creation of *South of the Mountain and North of the Water* indicates that Han Shaogong has been exploring his own path of literary creation by “using the transcendently unassertive heart to do the mundanely practical work” in his life journey from leaving hometown to returning hometown, and consciously practiced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moral conscience of a public intellectual. When Han Shaogong retired from the noisy and turbulent times, he not only experienced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his conversion to nature, and sought the authenticity of human nature between the south of the mountain and north of the water, but also acted in a simple and peaceful manner, so as to reconstruct 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explore and think about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words: Han Shaogong; *South of the Mountain and North of the Water*; intellectuals; hometown returning; true human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五四”时期鲁迅的《故乡》开启了近代中国文坛乡土小说的创作之风,其笔下的乡愁不仅

收稿日期: 2018-08-09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基地项目及奖励项目“突破与新变:新时期湖南文学的新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研究”(17JD56)

作者简介: 王 蕾(1988—),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

是对凋敝故乡的悲哀与惆怅,“更多地是以一种超越悲剧、超越哀愁的现代理性精神来烛照乡土社会封建结构中窒息‘乡土人’(这个‘乡土人’当然是整个国民精神的象征)的国民劣根性。”^{[1]38}而另一位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则遁入城市,在受到都市文明的极大“惊吓”之后,脑际中萌发的“精神还乡”之思开始融入他的个人创作之中。田园牧歌式的故土湘西成为了沈从文忘却城市文明所带来的隐痛,安抚漂泊无依、千疮百孔灵魂的精神之思。近代工业文明的兴盛导致了城市文明的崛起和乡村文明的式微,中国传统宗族伦理观念与欧美先进的城市文明相比较,“它无疑是一种封闭和断裂,在进入现代社会(工业文明以来)后,中国和拉美都成了‘欧洲文明宴席上的匆匆迟到者’。”^{[1]36}改革开放之后的几十年,当代知识分子在参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过程当中,经历着来自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世俗化的双重冲击,原有的道德价值体系崩盘,而新的尚未建立完善,本应为社会发展提供价值支撑的知识分子群体面临着集体失语之态。对现代知识分子而言,“现代文明对人的异化和物欲横流的种种丑恶,使他们陷身于一种身份认同的危机。”^{[2]13}他们不同程度地陷入了精神的迷茫与困顿之中,其中的一部分人为体制所吸纳,另一部分人则退回书斋奋笔疾书。在体制与书斋之间来回穿梭的当代作家韩少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转型中经历了人生的跌宕起伏,最终于2000年“出走”城市,毅然“还乡”——回到了他的“山南水北”。“在葬别父母和带大孩子以后,也许是时候了。我与妻子带着一条狗,走上了多年以前走过的路。”^[3]

一 “以出世之虚心做入世之实事”

海德格尔说:“还乡就是返回与本源的亲近。但是,唯有这样的人方可还乡,他早已而且许久以来一直在他乡流浪,备尝漫游的艰辛,现在又归根反本。因为他在异乡异地已经领悟到求索之物的本性,因而还乡时得以有足够丰富的阅历……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4]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乡村”的涵义在某种意义上指向“家园”,所谓“落叶归根、安土重迁、衣锦还乡”便是此意;因而中国人往往故土难离,文人尤甚。乡土之“根”更成为了飘

零在外的游子寻求精神慰藉的“庇护所”。“文革”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韩少功以《文学的“根”》一文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寻根”热潮。对韩少功他们这一代“知青”而言,乡村的记忆是他们一生永远无法揩去的过往。于是,韩少功、张炜、张承志、贾平凹等一批活跃在当代文坛的作家,在现代化语境中掀起“还乡”母题的创作潮流,旨在追寻东方文化民族传统之“根”,而“所谓寻根就是力图寻找一种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5]。这种“东方文化”并不是传统的儒家经典,而是隐匿或显现于乡间的野史、传说故事、俚语。由于这一群“知青”作家都曾扎根农村多年,乡村的风土人情和朴素风貌在他们那一代人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因此这些作家对故乡的批判、眷恋或赞美在当代文学的创作史中必然会留下深深的痕迹。他们出生或成长于令人缱绻的乡村,长大以后出走家乡踏入城市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可是繁华都市的背后却隐匿着复杂的明争暗斗,因而这一群有着特殊背景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在不断地“离乡—还乡”中书写对理想精神世界的向往,渴望能够真正“诗意地栖居”。在海德格尔看来,“‘诗意地栖居’意思就是:置身于诸神的当前之中,并且受到物之本质切近的震颤。”^{[6]46}贴近本源,回归大地,追溯心灵的慰藉,海德格尔把还乡看成了人本的回归,看成是关于“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现代哲学命题。从人的心灵角度去书写“从故乡来,到故乡去”的任务就自然成为诗人与作家的“天职”。^[7]湖湘作家中,沈从文对湘西自然旖旎风光的钟情,并非源自文人墨客的附庸风雅,而是“一种由生物的美与爱有所启示,在沉静中生长的宗教情绪,无所归纳,我因之一部分生命,竟完全消失在对一切自然的皈依中”^[8]所饱含的赤子之心。汪曾祺曾指出:“沈先生从乡下跑到大城市,对上流社会的腐朽生活,对城里人的‘庸俗小气自私市侩’深恶痛绝,这引发了他的乡愁,使他对故乡尚未完全被现代物质文明所摧毁的淳朴民风十分怀念。”^[9]都市文明的冲击使得这位“乡下人”的选择蕴蓄着“反弹与自卫”,他的“精神还乡”让他明白了自己,也寻找到了生命存在的根源。周立波延续“五四”乡土小说的风格,创作出了“具有淳深浓郁的湖南乡土味,又极其自然和谐地做到了融民俗风情于乡土味,

融时代精神于乡土味，融历史意识于乡土味，融现实变革于乡土味，融传统美德于乡土味，融革命理想于乡土味，把生活事件与乡土情愫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并以之凝铸成生动的情节和鲜明的形象，渲印着时代的画面和社会的寓意”^[10]的小说作品。20世纪90年代以来，湖湘作家笔下的怀乡情结不再是政治意义或精神上的乡愁对应物，“其魅力不仅在于所特有的地域文化特色，展示了一个更接近于自然本色的生活风貌，还在于人与自然本真、和谐栖居的生态美在这一载体上得以展现。”^[11]对乡土文明的关注，成为了湘籍作家韩少功小说引人注目的题材特色，无论是初涉文坛为政治改革所创作的短篇小说《月兰》《西望茅草地》等，还是为文化寻根另辟蹊径所作的中篇小说《爸爸爸》《归去来》等，亦或是为边缘文化争取话语权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莫不如此。韩少功历经青年时代的坎坷重归都市，却倍感自己与城市文明的疏离。他毫不避讳地表达出对这种城市生活的厌倦，“我一直不愿被城市的高楼所挤压，不愿被城市的噪声所灼烧，不愿被城市的电梯和沙发一次次拘押。”^[12]于是他追随心中所向往的山山水水，“扑通一声扑进画框里来了。”^[12]

韩少功是一位思想型的作家，其小说、随笔、演讲等都曾对当代社会的形形色色问题作过认真的分析和思考。多年来，韩少功一直“以出世之虚心做入世之实事，提防心路上的暗礁和险滩”^[13]。他更是一位行动者，善于在生活的跌宕流变中迂回地把握自己的方向。纵观韩少功一生的经历，他既能够在康庄大道人声鼎沸之时悄然回归另辟“小径”，又能够在觥筹交错熙熙攘攘之际激流勇退抽身离场，回归“初心”。他从湖南的乡村出走，只为追寻“南方的自由”而来到海岛。若干年后，当小岛不再纯粹宁静，他又一次选择了逃离。他的逃离不是“躲避喧嚣，恰恰是为了获得更为清醒豁然的视角来切入现实、厘清现实，进而更好地干预现实，在精神上则始终谋求远离中心的边缘立场与自由境界。”^[14]这种“出世之虚心”证明：韩少功以自由的信念来保有其个人思想的独立性，在精神上与主流意识话语时刻保持距离。而“入世之实事”则凸显了韩少功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这种“知

识分子将理念转化为实践，投入社会来承担责任、发挥功能”^[14]。他创作的《山南水北》，一经出版便在当年荣获“第五届华语传媒大奖·2006年度杰出作家”，授奖辞中写道：“韩少功的写作和返乡，既是当代中国的文化事件，也是文人理想的个体实践。他的乡居生活，不失生命的自得与朴素，而他的文字，却常常显露出警觉的表情。他把一个知识分子的生存焦虑，释放在广大的山野之间，并用一种简单的劳动美学，与重大的精神难题较量，为自我求证新的意义。”^[15]

事实上，他的还乡迁居只是一种方式。《山南水北》“作为他退隐生活的实录，充满声音、色彩、味道和世相的生动描述，并洋溢着土地和汗水的新鲜气息。这种经由五官、四肢、头脑和心灵共同完成的写作，不仅是个人生活史的见证，更是身体朝向大地的一次扎根。”^[15]从乡村出走重归都市，再从城市退回乡村并融入自然，韩少功用笔记录下生命的感悟，找寻着精神的成长与救赎。他的所谓“逃离”不是对世事的消极失望，恰恰相反，多年来韩少功一直热切地关注众生世相，他在山南水北间追寻着人性的本真、重构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之态。返回乡村过上晴耕雨读的闲适生活，他依旧不改初心，身体力行地践行着一个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也正是当初为何他要坚持文学创作这条路，并用“文学重新走向内心，走向文明的感动和创造，走向当代人可能的文明再生和精神圣诞”^[16]来证明自己。

二 在“山南水北”中追寻本真的人性

韩少功在《进步的回退》一文中曾提及自己“还乡”一事：“当很多富裕起来的中国农民从乡村进入城市的时候，我算是一个逆行者，两年前开始阶段性地离开城市，大半时间定居中国南方的一个偏僻山区——我在上一个世纪六十年代当知青的地方，曾经进入过我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及其他作品。”^[17]也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逆行者”，选择了在日益充沛的物质面前激流勇退，践行了一场身体与精神的“回退”，这种回退“需要我们经常减除物质欲望，减除对知识、技术的依赖和迷信，需要我们一次次回到原始的赤子状态，直接面对一座高山或一片树林来理解生命的意义。”^[17]韩少功将自己从浮躁的环境中脱离出

来,并把自己对时代的忧患转化成一种沉静博爱的文化情怀。在市场经济大潮和物质文明的激荡中,人们追名逐利、远离生命的本真;然而韩少功《山南水北》的字里行间,却是对自我生命内在价值的探寻、对人生的意义的叩问。

韩少功的“还乡”之举也曾被一些人误解为“反现代”的言行。笔者认为,他的“还乡”其实是对“现代人性理解或对人性的假设,和建立在其上的现代生活方式”^[18]的不满,因为在他看来,没有人性的重建,也就难以真正实现合理的文明制度。因此,韩少功多年来不仅以独特的视角观察与思索着事关人类社会和人性欲望的问题,更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回归“底层”环境,与乡间群体“打成一片”,实实在在地感受他们最真实的生存苦恼。在乡间的生活,让他更笃定地相信“把我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的伟大力量,与GDP所代表的经济和技术进步没有什么关系,而是潜藏在几千年历史中永远不会熄灭的良知和同情,是我们读到一首诗或一篇小说时瞬间的感动”^[17]。

必须看到,韩少功是以一个“异乡人”而不是像沈从文那样以“乡下人”的身份还乡的。“异乡人”出生于城市,青年时代下放农村后返回都市,人至暮年再次回归,其与沈从文对乡村文明的解读自然有所差异。《山南水北》中城乡对比几乎贯穿始终,借以“体现作者徘徊于城市与乡村、现代性批判与启蒙理性批判之间的一贯创作理念”^[19]。还乡之后所看到的月亮让作者感到“在三十多年的漫长白天之后来到了一个真正的夜晚”,这是飘零在繁华都市所无法见到的“美景”。这样一个美丽的月夜让“我突然明白了,所谓城市,无非是逃避上帝的地方,是没有上帝召见和盘问的地方”^[20]。还乡后的生活让作者感慨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亦让他从中明白了“所谓人性,既包含情感也包含欲望。情感多与过去的事物相连,欲望多与未来的事物相连,因此情感大多是守旧,欲望大多是求新”^[21]。也许,在乡村住久了依旧会偶尔念及城市的车水马龙。城市生活的最大便利在于高楼耸立之间人们互为隐者的一份轻松,其不同于人口稀少的乡村,邻里之间互相熟悉的程度足以让个人生活隐私处于长期“暴露”之中,韩少功因此不无尴尬地感慨:“即便是在一个山坡上独自翻地,即便四野空阔无人,我也感自己

是一个公共场所的雕像,日长月久的示众,多少有点累。”^[22]历经城市文化的熏陶与乡村文明的洗礼,韩少功书写着自己眼中的城乡变化。他透过文字告知世人,现代化进程之下的工业文明只会让人类越来越远离土地,成为没有灵魂的枯木,因为“总有一天,在工业化和商品化的大潮激荡之处,人们终究会猛然醒过来,终究会明白绿遍天涯的大地仍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得多”^[23]。城市才是离造物主最远的边疆之地,是“大自然的沦陷之地,那些傲慢乡土的城里人其实是一些聋溃之人,壅塞之人,残疾之人,是造物主放逐之人”^[16]。

只有回到静谧的山南水北之间,韩少功才感受到乡村人性的淳朴本真、率性自然。乡村和谐的人际交往让他感慨:乡村的农民虽然读书少,不会或者很少会用抽象概念,形象性的细节和纯“接地气”式的语言表述,总会让人觉得像一场思维独特的脱口秀。韩少功用“欣悦和深情的笔调来描绘山居生活,描绘与之为邻的贫寒却不乏宽厚与大度的乡民,展现了乡村生活世界与众不同的认识方式、行为方式和伦理规范”^[24]。玉梅与金花因为一点误会而结下仇怨,曾经的睦邻因此断了往来,甚至连鸡鸭也不再互访。当后来玉梅得知真相,往事“历历在目,件件滴血,桩桩迸泪”,却再也无法追回往昔的情愫。^[25]“意见领袖”绪非爹喜爱评论国事,从海南岛上空的中美撞机到台湾问题的讨论,从对乡政府官员的破口大骂到对日本靖国神社参拜的不满,绪非爹绝不让自己“缺席”任何一场“民生大事”。他的一本正经反而让身为知识分子的作者韩少功感到乡村老汉身上可笑之中的可爱,以致在结尾处诙谐地写道:“他的原子弹还处在划火柴的水平,大概不会让日本人民过于紧张。”^[26]八溪乡间的邻里除了贺麻子、绪非爹,还有会看风水的开船汉有根、山间神医塌鼻子、卫星佬毛伢子、城里来的农痴余老板、挥舞“青龙偃月刀”的乡间剃头匠老何、有点神通的活宝笑大爷……这些个性鲜明的乡村之人身上既有人性的纯善与宽容,也有局限与幼稚,他们的笑脸天然且多样,言辞粗俗且真诚,思维独特且单一,相较之下,“都市里的笑容已经平均化,具有某有近似性和趋同性。”^[27]中国的乡土绝不是单一的个人世界,这是一个人、鬼、

神并存的世界。这里的“每一个社群会以它的方式来让社群中的个体和社群之间建立起这种认同，从而保证社群的迁延和凝聚”^{[21]20}。都市之人迁居他乡，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四处飘荡，而群居式的乡村之人，世代代在同一片乡土环境中演绎着各种似曾相识的民间故事。定居乡间的“守灵人”在先辈们的坟地之中来回穿梭，这里没有什么虚无，所存留的是一种国人“视之传统核心的孝道，一种慎终怀远乃至厚古薄今”^[28]的虔诚之态。

从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乡村人事记叙中，我们很难用都市文明的理性去规范乡村民风的处事准则，这里面很难得出对错分明、非此即彼的客观结论，似乎每一件发生的非常规之事都有着情有可原的理由。“法外有法，非法法也”^[29]，山村乡民心中有一套高于法律的潜规则，可以颠倒主次，造出“冤假错案”。从城市退出，韩少功就是因为厌倦了所谓上等人的多愁善感，更受不了频繁的人际交往中的虚与委蛇，所以他走进乡村，开始关注底层人群的生存境遇。回到底层的韩少功重新出发，从文化寻根转向精神寻根，他始终认为：“作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但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从底层看，看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状态。人可以向上看，但如果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候都向上看，这就与我们整个人类文明的精神背道而驰。不管是宗教，还是哲学、文学，从来都离不开一种悲世情怀，都需要向下看，看到弱者的生存。”^[24]他将个人的人生体验与乡村人群的经历融为一体，穿梭在城市与乡村之间，都市文明的规范化、理性化与乡野民间风俗的非规范化、边缘化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不规范的民间人、事表达恰巧是“礼失求诸野”的集中表现。也正因为不受常规礼教的过多约束，这种生命的原动力才得以尽情地释放，韩少功对现代性的反思也由此从对个体生命本身而走向了更为深广的人类生存之思，“是对‘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一次实践性的回答，是混合着汗水和土味的回答，也是一种更为切实的回答。”^[30]

三 用文字重构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

曾经的知青生活对于韩少功而言，“已经不只是一种简单的知青生活记忆和情感，它已经上升为一种精神联系，一种蕴藏于心的文化影响。”^[31]

青年时代的记忆并没有让韩少功对体力劳动产生厌恶，他觉得在那青山绿水间挥汗如雨的辛勤劳作，才是最接近本源、最自由自在的生活。《开荒第一天》中“我”无比怀念劳动，并且“看不起不劳动的人，那些在工地上刚干上三分钟就鼻斜嘴歪尿尿横流的小白脸”^{[32]35}。农业劳动不仅能够如体育锻炼那般强人体魄，更可以让人亲近造物主，享受创造生命的快乐与纯净。“我们要亲手创造出植物、动物以及微生物，在生命之链最原初的地方接管我们的生活，收回自己这一辈子该出力时就出力的权利。”^{[32]37}韩少功的“晴耕雨读”绝不是一场豪情壮语的作秀，他深知农业是人类在大地上栖居的根本。通过身体力行的田间劳作，他不再是一个冷眼旁观的评述者，而是融入其间，参与其中，得日月之恩，参赞天地之化育。通过自己劳作所得的瓜果蔬菜虽然微不足道，但是“我把这些报表通过因特网发给了国内和国外的所有亲人，算是一份来自八溪洞的红头文件”^[33]。对“劳动”的赞美，体现出韩少功对人与自然之间深层关系的审美反思和现代性体验。他曾说：“乡下有很多的动物和植物，动物今天打闹明天发情，植物今天发芽明天开花，有很多变化，比都市的生活要更加丰富，不像城里人想劳动也大多只能刷刷碗拖拖地板，过于单调。我希望过一种自然与文明相平衡的生活，一种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生活，这在乡村就比较方便。在我看来，这不是远离现代文明，恰好是追求更健康的现代文明。”^[34]

大自然孕育了世间万物，是人类心灵栖息的精神乐园。在韩少功的笔下，八溪乡的“万物似乎都具有灵性，他们的生命力蓬勃向上，显示着自然的丰沛和博大”^[35]。这里的一草一木，一鸟一虫，一土一石似乎都与人类一样，有着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主体意识。《蠢树》中“葡萄就是小姐身子丫环命，脾气大的很，心眼小得很”^[36]。当作者不小心一剪子惹恼了它，从而“让它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来了个英勇的以死抗争。你小子剪什么剪？老娘躲不起，但死得起，不活了！”^[36]《诗猫》里，心事浩茫思接千古的小猫咪咪，“它把老鼠吓得无影无踪，自以为英雄盖世，仗着自己的年少气盛，更是独立和反叛……它情愿雍容矜持地蹲在墙头，观赏学校那边的广播体操或者篮

球赛,凝固在月光里或霞光里,如一尊久经沧桑的诗人。”^[37]《村口疯树》引发出神秘气息,得罪了树神的后生们“后来经常把蓑衣和草帽不按规矩穿戴,甚至把两只鞋子也故意穿反,把两只袜子故意套在手上,把妇女的花头巾故意缠在头上,给这个山村带来一些特殊景象”^[38]。以避免被树神认出而惹上麻烦。还有那些对“低智能人类讥笑”的智蛙(《智蛙》)、心性不一的草木(《再说草木》)、“他鸡即地狱”的养鸡之乐(《养鸡》《小红点的故事》)、为主人尽忠尽善的“呵子”与“三毛”(《山中异犬》《三毛的来去》)等等。这些乡间常见之物在韩少功的眼中是如此具有生命的活力与灵性。“种花种树种菜种出了妙不可言的趣味,养鸡养猫养狗养出了难以割舍的感情,这难道不是进入了人生之佳境么?”^[39]韩少功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山野自然的亲近。这些自然万物所呈现出来的“原象”,在作者的笔下尚未经现代文明的“训导”保有本真的状态。这种“本真”是人与自然最纯粹的交流,是人们在除去世俗功利、从城市喧嚣逃离之后对自然最虔诚的“告白”。

韩少功在自己的精神乐园中,怀揣着敬畏和谦卑之心,努力构筑着“天人合一”的和谐之路。游走在都市与乡村之间几十年的韩少功的每一次“出走”,都代表着他对一种现代生活方式的自觉寻找。无论是在人潮鼎沸的都市定居,还是皈依自然、亲近山水的蛰居,他都能够运用理性主义者的冷静与务实之态来认真对待。批判都市,但不拒绝都市文明;回归自然,但绝非成为逃避世俗的隐者。他并没有把笔下的乡村浪漫化、理想化,相反的是,“他秉持着现实主义、理性主义的姿态,对中国乡村由于传统的因袭和现代文明的挤压所造成的双重困境,有着清醒的认识与适度的揭示。”^[40]诚如海德格尔在评论荷尔德林的诗歌《诗人的天职》时指出:“诗人的天职是返乡,惟通过返乡,故乡才作为达乎本源的切近国度而得到准备。守护那达乎极乐的有所隐匿的切近之神秘,并且在守护之际把这个神秘展开出来,这乃是返乡的忧心。”^{[6][31]}一路走来,韩少功既是一个负有自觉责任担当的人文知识分子,又是一个虔诚的自然之子,他清楚地知道“知识分子的最高责任就是要善于理解自身所处的时代,

把所关注到的和关切的事实呈现出来,并且给这个事实以充分的理解。如果我们对已经遭遇到的困难、问题和诸多的现象不能给予理解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学者个人,或者一个民族的思考,会陷入一种思维的困顿、迷茫和焦虑”^[41]。作为一名大地之子,他以朴素的赤子之心、平和的处事之态,完美地将对自然的敬畏、人生的思索以及文学的价值意义融合在山、水、人、事之间。“如果没有这么多人与我相伴度过此生,如果没有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创造,我至少不会读书和写作,眼下更不会懂得自省和感激。我在这个世界上将是一具没有心肝的行尸走肉。”^[42]惟其如此,韩少功的还乡书写才“必然会从现实、文化层面深入到对于生命和存在本质的思考,从大地上的故乡走向大地故乡本身”^{[2][128]}。皈依自然是因为心存感恩,被城市滋养了30余年的韩少功,人至暮年常忆旧。白首最念少年时!也许,“三十年后回到家乡,之所以要在这样一个山村的深夜里失眠,最重要的理由,也许就是要重逢那一个夏天。”^[43]

回顾韩少功的创作历程,“从‘启蒙者’到‘旁观者’再到‘隐居者’,叙述视角的变化和自我意识的迁移几乎同时发生。与这种变化相伴随的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关系的调整。”^[44]《山南水北》的创作以及韩少功在“山南水北”中诗意的栖居,不仅是在重建现代知识分子与乡土文明的关系,更是在探索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过程中思考人类命运的去、现代与未来。

参考文献:

- [1] 丁帆.乡土:寻找与逃离[J].文艺评论,1992(3).
- [2] 何平.现代小说还乡母题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 [3] 韩少功.回到从前[M]//韩少功.山南水北.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9.
- [4] 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M].郗元宝,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87.
- [5] 韩少功.东方的寻找和重造,在后台的后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279.
- [6]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7] 姚国军.略论鲁迅开启的知识分子还乡小说传统[J].

- 鲁迅研究月刊, 2015(7): 24.
- [8] 沈从文. 水云 [M]// 沈从文. 沈从文文集: 第 10 卷.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 288.
- [9] 汪曾祺. 又读《边城》[M]// 汪曾祺. 汪曾祺文集: 文论卷.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4: 99.
- [10] 贺绍俊. 周立波在乡土文学上的特殊意义 [J]. 理论与创作, 2008(5): 8.
- [11] 彭文忠. 湖南乡土文学生态价值论述 [J]. 文艺争鸣, 2008(8): 108.
- [12] 韩少功. 扑进画框 [M]// 韩少功. 山南水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5.
- [13] 韩少功. 佛魔一念间, 在后台的后台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 2008: 73.
- [14] 陈 乐. 现代性的文学叙事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 [15] 谢有顺. 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专辑·2006 年度杰出作家韩少功授奖词 [J]. 当代作家评论, 2007(3): 113.
- [16] 孔 见. 韩少功评传 [M].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8.
- [17] 韩少功. 进步的回退, 进步的回退 [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
- [18] 刘复生, 张硕果, 石晓岩. 另类视野与文学时间: 韩少功文学创作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224.
- [19] 陈娇华. 返乡散文的两种书写范式:《山南水北》与《一个人的村庄》比较 [J]. 名作欣赏, 2014(27): 129.
- [20] 韩少功. 月夜 [M]// 韩少功. 山南水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5: 46.
- [21] 韩少功. 怀旧的成本 [M]// 韩少功. 山南水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5: 32.
- [22] 韩少功. 隐者之城 [M]// 韩少功. 山南水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5: 150.
- [23] 韩少功. CULTURE [M]// 韩少功. 山南水北 [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5: 61.
- [24] 韩少功. 文学要改革 眼睛须向下 [N]. 文学报, 2001-08-30(01).
- [25] 韩少功. 乡村英文 [M]// 韩少功. 山南水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5: 88.
- [26] 韩少功. 意见领袖 [M]// 韩少功. 山南水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5: 117.
- [27] 韩少功. 笑脸 [M]// 韩少功. 山南水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5: 23.
- [28] 韩少功. 守灵人 [M]// 韩少功. 山南水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5: 84.
- [29] 韩少功. 非法法也 [M]// 韩少功. 山南水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5: 210.
- [30] 史玉峰.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寻根意识研究: 以鲁迅、沈从文、韩少功为例 [D].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12.
- [31] 贺仲明. 文化纠结中的深入与迷茫: 论韩少功的创作精神及其文学意义 [J]. 文学评论, 2009(5): 111.
- [32] 韩少功. 开荒第一天 [M]// 韩少功. 山南水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5.
- [33] 韩少功. 红头文件 [M]// 韩少功. 山南水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5: 58.
- [34] 舒晋瑜. 希望知识分子更优秀一些: 访作家韩少功 [N]. 中华读书报, 2002-09-25(07).
- [35] 陈家洋. 回归山野自然, 彰显乡村意义: 评韩少功的《山南水北》[J]. 当代文坛, 2007(4): 109.
- [36] 韩少功. 蠢树 [M]// 韩少功. 山南水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5: 52.
- [37] 韩少功. 诗猫 [M]// 韩少功. 山南水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5: 122.
- [38] 韩少功. 村口疯树 [M]// 韩少功. 山南水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5: 45.
- [39] 魏 委. 人生佳境: 品读《山南水北》[J]. 理论与创作, 2008(2): 70.
- [40] 龚政文. 从《山南水北》看韩少功的人生取向与艺术追求 [J]. 中国文学研究, 2008(2): 97.
- [41] 付长珍. 从“还乡”到“疏离”: 现代性视阈中的当代知识分子与农村问题 [J]. 社会科学, 2007(11): 95.
- [42] 韩少功. 感激 [M]// 韩少功. 山南水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5: 137.
- [43] 韩少功. 秋夜梦醒 [M]// 韩少功. 山南水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5: 324.
- [44] 杨庆祥. 韩少功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宿命: 以《山南水北》为讨论起点 [J]. 扬子江评论, 2009(6): 6.

责任编辑: 黄声波